

· 药物研制创新与知识建构 ·

本草奇珍：冬虫夏草医药史探微 (1711—1893)

辛 豪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上海 200433)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冬虫夏草的汉文知识谱系与药用起源问题众说纷纭，系统研究较为薄弱。经文献交叉考证可知，其明确记载最早见于1711年朱璋的《观树堂诗集》，较现有推断早约20年。伴随着冬虫夏草逐渐被纳入中医本草体系，吴仪洛与赵学敏等本草学家综合运用性味药理与法象药理的解释方法，并以阴阳为纲纪对冬虫夏草的自然史知识进行理论建构，从而形成了可供清人理解的医药知识框架。其后，唐秉钧、王孟英等医家以重视效验的态度进一步确认其疗效，终使冬虫夏草成为治疗肺疾、咳症及诸虚百损的神奇本草。尽管清代医药学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仍受时代局限，但其对冬虫夏草的阐释，为理解传统药物知识的形成机制及中医药历史的演进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冬虫夏草；《观树堂诗集》；本草学家；药性理论；医药知识；药用实践

DOI: 10.16307/j.1673-6281.2026.01.005

中图分类号: R-092; R2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6)01-0033-14

The Medicinal History of *Dong Chong Xia Cao*: An Exploration from 1711 to 1893

XIN H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scholarly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and the medicinal origins of *Dong Chong Xia Cao* (冬虫夏草 Cordyceps) have been diverse, with systematic research being relatively scarce. Through cross-referencing of literature, it is evident that its first clear record appeared in *Guan Shu Tang Shi Ji* (《观树堂诗集》 *Guanshutang Poetry Collection*) by Zhu Zhang (朱璋) in 1711, approximately twenty years earlier than previously suggested. As *Dong Chong Xia Cao* gradually entered the system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lassical pharmacologists like Wu Yiluo (吴仪洛) and Zhao Xueming (赵学敏) comprehensively applied the pharmacology of properties and tastes (性味药理) along with the pharmacology of therapeutic actions and patterns (法象药理) in their method of interpreting medicinal substances,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of yin-yang (阴阳)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its natural history. This framework made the medicinal knowledge of *Dong Chong Xia Cao* accessible to the Qing

[作者简介] 辛豪 (ORCID: 0009-0001-8292-4754), 博士生; E-mail: hxin24@m.fudan.edu.cn

Dynasty intellectuals. Later, physicians such as Tang Bingjun (唐秉钧) and Wang Mengying (王孟英), emphasizing empirical evidence, further confirmed its therapeutic effects, ultimately establishing *Dong Chong Xia Cao* as a miraculous herb for treating pulmonary diseases, coughs, and various forms of debility. Although the theoretical systems and practices of Qing Dynasty medical scholars were still constrained by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their elucidation of *Dong Chong Xia Cao* offered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raditional medicinal knowledg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Dong Chong Xia Cao* (冬虫夏草 Cordyceps); *Guan Shu Tang Shi Ji* (《观树堂诗集》*Guanshutang Poetry Collection*); Pharmacologists; Pharmacological Theory; Medicinal Knowledge; Medicinal Practice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冬虫夏草，《中华药典》定义为麦角菌科真菌冬虫夏草菌【*Cordyceps sinensis* (Berk.) Sacc.】寄生在蝙蝠蛾科昆虫幼虫上的子座和幼虫尸体的干燥复合体^{①①9}，其产地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地区。目前国内关于冬虫夏草的研究，主要由理工科学者主导，集中在人工培育、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分析三个方面^①。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体育界“马家军”事件的余波^②，人文社科领域也开始关注并研究冬虫夏草，因为起步较晚，相关成果零星分布在不同学科，呈现支离之感^③。国外学者对冬虫夏草的研究多以经济学、社会学及生态学的视角切入，探讨冬虫夏草采集、贸易对低收入社区经济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高原生态的影响^④。但也有学者将视角延展至物质文化史及科学技术史领域，如卡拉·纳皮（Carla Nappi）强调，在社会文化视域下，冬虫夏草在实践网络中被重新改造定义的过程，需警惕殖民霸权问题^⑤；芦笛以全景式的微观视角，呈现了冬虫夏草在跨地理、政治和文化流转过程中所蕴含的科学实践、知识传播、知识网络，以及异域文化适应，跨国权力关系等诸多议题^⑥。以上研究使笔者受益良多，但他

- ① 2015年首届全国虫草会议暨冬虫夏草产业高峰论坛的参会者几乎都为理工科学者，参见董彩虹等《我国虫草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展望——虫草产业发展金湖宣言》（《菌物学报》2016年第1期，第1-15页），林津晶、王勇《冬虫夏草国内文献综述》（《海峡药学》2007年第5期，第8-10页）。
- ② 参见弋戈《“马家军”引出的话题——冬虫夏草要义汇观》（《体育与科学》1994年第3期，第6-7页）。
- ③ 有关冬虫夏草的史料挖掘，参见芦笛《20世纪初以前西方学者对中国冬虫夏草的记载和研究》（《菌物研究》2013年第12期，第234-244页）。关于日益急迫的虫草采集权立法问题，参见李琼、马德《虫草临时采集权流转合法化之立法分析——以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为例》（《青藏高原生态研究》2016年第3期，第42-48页）。关于冬虫夏草对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参见王立明、冶生敏《牧区藏族的生产方式与国家立法规制——以青海省冬虫夏草立法规制为视角》（《藏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46-53页）。亦有学者通过人类学的调查方式，探明了云南北部山区的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和藏族群众对冬虫夏草的利用现状，参见陈吉岳、杨大荣、彭艳琼《冬虫夏草云南产区的民族药理学利用现状》（《中国草地学报》2010年第1期，第48-50页）。范长风引入经济人类学中的制度范式，阐释了阿尼玛卿山区的虫草经济经历的三个不同的形态和阶段，参见范长风《冬虫夏草产地的政治和文化传导：阿尼玛卿山虫草社会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西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37-47页）。杨大荣等学者实地考察了冬虫夏草在中国的地理分布，纠正了过去三十年来学界对冬虫夏草生态分布的错误认知，并呼吁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入手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冬虫夏草这一宝贵资源，参见杨大荣、彭艳琼、陈吉岳等《中国冬虫夏草分布格局与环境变化对其分布影响》（《中国草地学报》2010年第7期，第22-27页）。
- ④ 参见 Winkler, “*Yartsa Gunbu (Cordyceps sinensis) and the Fungal Commodification of Tibet’s Rural Economy*”, *Economic Botany*, 2017:291-305. 以及 Shrestha, Uttam Babu and K. S. Bawa,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caterpillar fungus to the livelihoods of mountain communities in Nepal*”,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14:194-202. 以及 SS Garbyal, K K Aggarwal and C R Babu, “*Impact of Cordyceps sinensis in the rural economy of interior villages of Dharchula sub-division of Kumaon Himalayas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society*”, *India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2004:182-186.
- ⑤ Di Lu,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1700-1949—A Microhistory of the Caterpillar Fungus*,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23. 其中第一章探讨了清末虫草作为一种物产、奇珍、药品在中国社会的出现和传播。

们未曾深究冬虫夏草作为本草的珍贵属性，尤其未能将冬虫夏草从发现到药用历程连贯呈现，从而解析冬虫夏草从边陲的新奇异物蜕变为本草奇珍的过程所包含的诸多面向，因此本文希冀重构冬虫夏草作为本草物质的完整历史。

一、奇物追溯：冬虫夏草的发现与汉文知识谱系的生成

2015年江西海昏侯墓出土了类似冬虫夏草的植物遗存，有学者借此认为冬虫夏草的历史可以向上追溯至西汉时期，甚至据此改写中国养生文化的历史。但殊为遗憾的是，根据科学检验，此形似冬虫夏草的物质可能为某种叶子或者为地黄炮制品，而非冬虫夏草^①。

实际上，关于冬虫夏草首次被汉文典籍记载及其药用始于何时，学术界多有争议，但如果将这一关键问题搁置，则无法准确还原对冬虫夏草的初始认知，更遑论重塑冬虫夏草的药用历史。所以探明冬虫夏草首次被记载的准确时间，并厘清冬虫夏草的汉文知识谱系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②。有学者认为，汉文典籍中最早记载冬虫夏草的是明代医学家龚廷贤所著《寿世保元》^{[3]78}，同时学界有观点推测抑或是雍正年间的《四川通志》^[4]及唐方沂的《青藜徐照》^[5]，但是否可信，仍需要精密考证后才可确定。有学者指出明代《寿世保元》药性四百味记载“冬虫夏草，味甘性温，虚劳咯血，阳痿遗精”^{[3]78}，但查《寿世保元》甲集一卷药性歌括可知，药性歌的药材记录起于人参，止于生姜，共393味中药，龚廷贤虚指为“四百”，并未有冬虫夏草^{[6]106-136}。因而有关冬虫夏草的记载显是后世窜入或伪造，但《寿世保元》版本繁多，《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著录76种^{[7]405-407}，多位学者依据康熙六年（1667）大业堂藏板刊本、雍正十年（1732）重梓本、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广城福文堂刻本、嘉庆十七年（1812）崇文堂刻本等主要版本进行了校刊，皆未见有关冬虫夏草之记载^③。同时此句的内容形式与药性歌有明显出入，以人参为例，药性歌载“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荣养卫”^{[7]106}。每一味药材，龚廷贤在药性歌中都直接用动词指明其药效，但上述有关冬虫夏草的记载却只述主治症状。因而综合版本和内容来看，《寿世保元》未曾记载冬虫夏草，相关内容应是后世造伪。

雍正年间编纂的《四川通志》对于冬虫夏草的记载明确可考，其书“西域里塘篇”言冬虫夏草“出拨浪工山，本草不载，性温暖，补精益髓”^{[8]28}，而此志开局于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十三年（1735）

- ① 笔者曾去函询问中国科学院杨益民教授及其团队，据其对实物的检测发现，海昏侯墓出土的并不是冬虫夏草，而是某种叶子，叶子的很多组织都降解了，所以叶子的种属很难界定。另据黄璐琦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的研究结果，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疑似冬虫夏草的植物遗存（“海昏草”）为中药地黄炮制品。详情参见《海昏侯墓中发现迄今为止最早的中药炮制品实物》（《中医健康养生》2020年8月，第2页）。
- ② 本文对于冬虫夏草的文本书写考证集中于汉文典籍，有关冬虫夏草的其他语言文献记载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如藏文对冬虫夏草的记载：一说是8世纪比若杂纳撰写的《本草秘诀汇集》最早记载了冬虫夏草的功效和配方。参见拉姆·罗布顿珠、米久《冬虫夏草研究进展概述》，（《西藏科技》2010年第10期，第13页）。有学者认为最早的藏文记载是宿喀年姆尼多吉的《千万舍利》，并认为冬虫夏草性温、味甘微涩的药性记载形式受中医本草的影响，参见Di Lu,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1700-1949—A Microhistory of the Caterpillar Fungus*,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23:27-31。亦有学者认为最早的藏文文献是《月王药诊》，参见郑依玲《冬虫夏草的药用历史及现代服务方法探讨》（《中药材》2017年第11期，第2722页）。但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未曾在该书的中译本见到关于冬虫夏草的记载。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藏药的文献知识可能是通过蒙古文或满文进入汉文的，参见卡拉·纳皮《本草：李时珍与近代早期中国博物学的转向》（北京：三联书店，2022年，第200页）。总体而言，学界对冬虫夏草藏文文献起源的探讨还未形成定论。
- ③ 参见龚云林《寿世保元》（上海：上海锦章书局，1955年，第28-35页）；龚廷贤撰，鲁兆麟主校《寿世保元》（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第46-70页）；龚廷贤撰，孙洽熙等点校《寿世保元》（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3年，第41-60页）；龚廷贤撰，袁钟点校《寿世保元》（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8-29页）；龚廷贤撰，王均宁等点校《寿世保元》（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43-66页）。

校补编纂成帙，并于乾隆元年（1736）刊行，由此可知冬虫夏草的记录时间可精确为1733—1736年。

据芦笛考证，《青藜馥照》记载冬虫夏草的时间为1716—1719年^[5]。实际上，上述学界所提到的典籍都并非最早，笔者所见两位宦蜀县令陈聂恒与朱璋的记述在起源上更早。陈聂恒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任长宁县知县^{[9]331}，后因抚字有方，听断明敏，于雍正元年（1723）升任刑部主事，《大清一统志》将陈聂恒列为名宦^{[10]650}。《边州闻见录》是其宦蜀期间所作，首次定稿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共八卷。两年后又补录后三卷至十一卷^{[10]99}，在书中他将冬虫夏草作为打箭炉特产，载于前八卷，他描写冬虫夏草“长径寸，如茗芽，雪消始见。根作虫形，黄色，盐水浸制无灰，酒服之，贵人要药。施伯干云，根濡濡泥土中，匪徒貌似”^{[11]144}。由定稿时间及冬虫夏草在书中的内容分布来看，陈聂恒知晓冬虫夏草的时间应不晚于1718年，由于陈聂恒本身患有肺病^①，他大概曾像文字记载中那样配酒服用过冬虫夏草，并且知晓用盐水浸泡去除新鲜冬虫夏草表面灰尘的方法。

同时与冬虫夏草一起出现的还有另外一名重要人物施伯干，伯干为其号，其姓名为施士岳，其祖、其父即为收复台湾的名将施琅、施世驃。施伯干于康熙五十年（1711）任四川遂宁县知县^{[10]352}，由于遂宁县与陈聂恒所主治的长宁县临近，两人于丙申秋（1716）在成都城外相识，施士岳赠予陈聂恒名贵的中江石，不过在陈聂恒看来，相较于宝石的馈赠，更为可贵的是结识施伯干这位将门之后^{[11]132}，两人在交谈期间或许因为提及陈聂恒的肺病而谈论到冬虫夏草，不过两者的谈论显然广泛且深入，甚至让陈聂恒产生了其论颇为迂腐的念想^{[11]132}。从两者相识的时间来看，我们可以进一步将陈聂恒记载冬虫夏草的时间精确为1716—1718年。

朱璋为浙江钱塘举人^②，与陈聂恒同为施伯干之友^③，曾于康熙戊子年（1708）至康熙丙申年（1716）宦蜀，知江油县。他在《观树堂诗集·古厅集二》中记载“夏草冬虫，产化林坪，夏为草，入冬化为虫，长三寸许，下跌六足，脰以上绝类蚕，羌俗采为上药。功与人参同。客未达，不敢尝也，家义渠缄寄二束”^④，并以诗叹之，“神农尝不到，孑草反生虫，化蛹形相似，为萤义或同，灵苗蠕浅土，上药腊奇功。物理应难格，遐搜问夔僮”^{[11]107,134}。很显然，朱璋在初次接触冬虫夏草时或出于对客人的礼貌，或出于对冬虫夏草自然知识的茫然，而不敢轻易尝试冬虫夏草，但在询问夔僮之后，且可能基于过往对于羌俗的了解^{[11]124,134}，朱璋选择相信冬虫夏草功比人参的药效，并向钱塘老家邮寄了两束冬虫夏草。由于《古厅集》四卷是按时间先后编排，因而我们可清晰地推断朱璋对冬虫夏草的记载，其时间当在庚寅年正月（1710）其亲睹月食至辛卯年除夕夜（1711）之间^{[11]124,134}，此应为目的所见汉文文本中对冬虫夏草的最早记载。并且，朱璋与陈聂恒的记述分别代表了冬虫夏草由地方奇物向医药认知转化的两个早期阶段：前者是自然观察与民俗认知的汇合，后者则显露出汉羌知识交流的初始迹象。

通过上述考证可以知悉，《寿世保元》的伪托反映了后世对冬虫夏草药性的追溯性想象，既往学界认为冬虫夏草在明代医学典籍已有记载是为误知。同时可以判定，冬虫夏草开始出现在汉文文本中并流通

① 陈聂恒诗中曾有“病肺何当出晚林，秋原无雨亦萧森”句，参见（清）卢文弨《常郡八邑艺文志12卷》（清光绪十六年刻本，第1831页）。

② （清）常明纂修，杨芳灿编纂嘉庆《四川通志6》卷一百五《职官（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40页），该文献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朱璋任江油县知县，但根据《观树堂诗集》其康熙戊子年（1708）方抵达江油县，并于康熙丙申年（1716）三月离蜀。参见（清）朱璋《观树堂诗集》（收录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7、189页）。

③ 朱璋还曾作诗称赞施伯干生性豪荡，胸次矜高。参见（清）朱璋《观树堂诗集》（收录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④ 古厅集四卷皆是朱璋在蜀地所作诗文，其中古厅为其江油县治下一古迹。朱璋取自李白《赠江油尉》“野燕巢官舍，溪云入古厅”一诗，并以之命名诗集。参见（清）常明纂修，杨芳灿编纂嘉庆《四川通志3》卷五十四《舆地志（五十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558页）。

于知识阶层之间的时间应为18世纪初。首次明确记载冬虫夏草的人为清代宦蜀官员朱璋，其在《观树堂诗集》中记载冬虫夏草的时间可精确为1710—1711年间，这比学界现已探明的《青藜余照》《四川通志》两部清代典籍的记载时间都要更早。同时两位宦蜀官员的记载也从侧面映衬出，伴随着清王朝对汉藏边陲地区的统治日益稳固，冬虫夏草也开始在汉地知识体系中稳定出现。由此我们可以明晰冬虫夏草被发现、记载及药用起源的准确时间，为重塑冬虫夏草的本草历史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药理为纲：冬虫夏草功效的理论推演

虽然朱璋早在1711年前就已经记载冬虫夏草，但直到半个世纪后，他的浙江同乡吴仪洛才在《本草从新》（1757）中明确指出冬虫夏草的药效，“甘，平。保肺益肾，止血化痰，已劳嗽”^{[12]30}。按照惯例，药物在进入本草体系前，会经过一定时间的检验识别，因而在对冬虫夏草进行本草分类之时，吴仪洛必然听闻过有关冬虫夏草的治疗经验，鉴于吴仪洛的医者身份，就算他在临床治疗中使用过冬虫夏草也不足为奇。这些轶闻与经验支撑了吴仪洛的本草撰写，然而尽管这些用药经验可能被归纳并上升为药性理论，但并不代表存在必然的趋势，吴仪洛率先将冬虫夏草纳入以阴阳为纲纪的本草网络，其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帮助冬虫夏草完成了进入汉文本草体系的重要一跃。在此重要前提之下，进一步明晰吴仪洛如何结合本草理论来认知冬虫夏草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而言，中医主流的释药理论有二，《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奠定了药物五味学说的理论基础，将食物的五味与身体、疾病相关联^{[13]217}，《神农本草经》则在序录中指出本草有寒热温凉四气，开创了药物性质标定的先河^{[14]序录2}，“四气”与“五味”理论共同奠定了以“性味”释药的路径。至宋金元时期，随着尚医士人的大规模涌现^①，用药实践不断丰富，药物品种不断增多，简单的四气五味理论渐渐难以应对纷繁的临床实际需要，兼之儒学格物致知的理念渗入到医学与本草学领域^②，基于本草形、色、气、味、体、质、生长、习性、功用等诸多物象，探讨其奏效机制的法象药理应运而生^③。法象药理的根基应当溯源于《周易》的取类比象思想，其书言“包牺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5]346}。取类比象以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的功能为支撑，成为先民探求宇宙万物的重要方式。尽管过往本草体系中的命名及用药不乏取类比象的先例，但真正让法象理论形成纲要并贯穿于本草体系的应属《圣济经》，作为宋徽宗亲撰的医论著作，此书曾作为学校课试命题蓝本，诏行全国，影响甚广，其卷九药理篇云“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16]190}，又“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16]185}。在宋徽宗看来，药物的一切自然之理都可通过象数来进行推衍，他初步指明了法象用药的基本纲领，“有因其性而为用者，有因其用而为使者，有因其所胜而为制者，其类不同，然通之皆有权，用之皆有法也”^{[16]195}。不过，宋徽宗时期的法象药理还算不上完善，后又经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等金元医家的完善，法象药理臻于成熟，金元医家以阴阳五行为纲纪，结合由此延伸的五运六气^④、脏腑经络理论及气味厚薄升降之理，法天象地，将人、药、天地自然相联结，建立了完整的“法象药理”框架，奠基了药物归经（包含引经报使）、升降浮沉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药性理论，从而让本草药性的阐释实现了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理论构建，为后世探求本草功用提供了重要指引。

① 关于两宋尚医人士大规模出现的原因，可参见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可参见 He Bian, *Know Your Remedies——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28-32.

③ 法象为哲学术语，其内涵泛指自然界所有现象之总称。

④ “五运”指金木水火土，“六气”指风寒湿燥火热。

尽管清代医家及本草学者在崇尚《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医药经典的氛围下^①，对金元医家的医药理论多有指摘。吴仪洛本人也曾就药方批评东垣、丹溪不过钱计而已，非深明造化、与时偕行者^{[17]3}，但法象药理的药物归经与升降浮沉理论依然为后世医者所法。吴仪洛本人不仅认可“深悉于气味阴阳，而药性剖其微也”的性味释药法^{[18]2}，而且也在《本草从新》的序言中指明“每药先辨气味、形色，次著其所入经络，乃为发明，而以主治之证具列于后”，他又强调“药品主治已注明某脏某腑者，则不更言入某经络，以重复无用也”，并且“阴阳、升降、浮沉已详于‘药性总义’中，故每品之下，不加重注”^{[12]凡例1-2}。吴仪洛无疑是在法象药理与性味药理的杂糅指导下标志、归类、认知、应用冬虫夏草等药物，涉及分类辨别药物的四性、五味、形色、归经、升降浮沉等方面。

吴仪洛的注解为我们深入理解冬虫夏草提供了依据，其在阐释冬虫夏草时所述甘、平，分别指冬虫夏草的味与性，按照其在药性总义中的说明“甘属土，入脾”“甘者能补，能和，能缓”^{[12]凡例2}，性平表明冬虫夏草的寒热界限不明显，药性平和，无明显特征。但除此之外，有关药材的形、色、质、体等要素吴仪洛皆未言明。如果仅按照上述药性总义中五味对应的五行关系，冬虫夏草药性属土，主治的应该是脾，但吴仪洛却强调冬虫夏草的主要功效为补肺肾，尽管他也言明“凡药各有形、性、气、质，其入诸经，有因形相类者，有因性相从者。有因气相求者，有因质相同者，自然之理，可以意得也”^{[12]药性总义1}，但却没有任何额外眉批来进一步解释上述药性理论对应的矛盾之处，这显示出他在处理新药物冬虫夏草时缺乏充足的理论支撑，而在处理人参等药用历史悠久的中药材时却从容得多，会旁征博引不同医家的观点，并通过眉批来抒发自己的见解。

同时在《本草从新》中，还有不少药材都被吴仪洛归纳为甘、平，但它们的主治却千差万别，有补中益气、和脾胃^{[12]4}，安五脏^{[12]7}，亦有除热解毒、补虚^{[12]106}，且在吴仪洛的记载中，能够滋补肺肾的药物还有甘菊花、阿胶、鸭，但他们的气、味、形、色特征却完全不同，这当然是基于本草形色气味等法象权通意使的结果。徐大椿也曾指明本草的使用之法，“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性，或取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18]34}，这种灵活的用药方式为后来者依据本草理论解析药物功用设置了障碍。在没有更多史料支撑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确定吴仪洛对冬虫夏草的本草知识从何而来，但很明显他的论述在药理理论的指引下出现了相互抵牾之处。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1778）中也对吴仪洛的药理总结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冬虫夏草）迩年苏郡渐有，但古来《本草》及草木诸典故从未之及，未详性味。近出吴遵程《从新》有此品，言保肺益肾，不道从何考据，余仍疑之，未敢轻尝。”^{[19]275-276}唐秉钧为清代著名医家唐千顷之子，亦精通医术，其质疑吴仪洛对于冬虫夏草的功效认知不知从何而来，值得推敲。

不过吴仪洛对冬虫夏草的药理认知还是影响到了后来的医家姚澜。姚澜，清道光年间山阴人（浙江绍兴），姚氏精于医术，曾撰《本草分经》，载有冬虫夏草，其自序云：“是编大约以《从新》为则，而于品味增益，于训诂则节删之。”^{[20]2}表明此书与《本草从新》之间的密切关联，不过姚澜的分类是以经络为纲，以药为目，完全以药物归经为主导。他将800余味中药分入十二正经、命门、奇经、不循经络杂品、附余十六篇类，在经络体系的分类之下，他又将药品分成补、和、攻、散、寒、热六类，对各药简述其药性、主治功效。姚澜的分类很好地解决了读者只识药材性、味、主治，而于所入之经络多有忽略的状况，恰恰补足了《本草从新》对冬虫夏草主治归经中只述五脏而不述经络的缺憾。但姚澜对冬虫夏草的记载与分类基本承袭于吴仪洛，其对冬虫夏草的药理认知为“甘，平。补肺肾，止血化痰、治劳嗽”^{[20]18,117}。在他看来，冬虫夏草是滋补良品，并以一药而兼入十二正经中的手太阴肺经、足少阴肾经，而根据药物归经的通用规律，只有色白、味辛、气腥、性属金者，入手太阴肺经；色黑、味咸、气腐、

① 参见郑金生《药林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70页）。

性属水者，入足少阴肾经^[12]药性总义²。这无疑与我们实际所见冬虫夏草的味甘、色黄、气香^①的特征相矛盾，姚澜对冬虫夏草的分类显然没有跳出吴仪洛划定的藩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僵硬对应之中。

龙柏是另一位尝试在脉络体系下对冬虫夏草进行解读的医者，他所编纂的《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以浮迟沉数四脉为大纲，以草木金石为部类，借以达到“脉药联珠”的目的，其书所载药物几乎皆取自《本草纲目》，龙氏只新增补遗 291 味。冬虫夏草正是新增补遗，龙柏将冬虫夏草置于“迟脉”大纲中的虫部药物，认为“冬虫夏草。味甘性温，秘精益气，专补命门。虫出嘉州。虫长寸许如蛴螬，草出尾端如石菖蒲，焙干用”^[21]³²²。根据中医常识，肺为气之本^[22]¹⁹，肾为精之处也^[22]¹⁹。同时根据脉法，命门为十二经之主，位在两肾之中，命门控制的相火与真气日夜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滞则病，息则死矣^[23]^{16,9}。命门实为元气之根本，生命之门户。在龙柏看来，冬虫夏草“秘精益气，专补命门”的滋补作用显然不仅作用于肺肾，对全身亦有大益。不过龙柏的分类方法有值得注意之处，即他将冬虫夏草归类为虫，折射出医者在处理冬虫夏草本草分类时的意见不一。

三、阴阳筑基：冬虫夏草的本草知识构建

吴仪洛、姚澜、龙柏的本草书籍编纂以临证治疗为核心，所以尽管他们在药性理论的指引下对冬虫夏草的药效作出了阐释，但对冬虫夏草的本草认知还是稍显匮乏，仅仅依托于抽象的药性理论，将冬虫夏草初步归置于传统本草体系之中。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运用阴阳理论对冬虫夏草的生长自然史进行知识建构，才最终让冬虫夏草被完全纳入本草体系。

赵学敏，钱塘人，出身于宦宦之家，在医药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幼时便在其父的监督下习读《灵素》《难经》及《伤寒论》等经典医书。同时赵学敏的读书范围十分广泛，对天文、历法、医药、卜算、方技之类的书籍都有涉猎^②，是清朝中后期医、药知识分离背景下少见的医、药兼通的大家^③，其渊博的本草知识推动了冬虫夏草进一步进入本草体系。赵学敏同样以时节特征来命名冬虫夏草，但他对冬虫夏草的称呼略有不同，名之为“夏草冬虫”，他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将冬虫夏草归为山草类，“（夏草冬虫）出四川江油县化林坪，夏为草，冬为虫，长三寸许，下跌六足，脰以上绝类蚕，羌俗采为上药。功与人参同”^[24]¹²⁹，而后引用《本草从新》《黔囊》《西城文见录》《柳崖外编》《柑园小识》等著作进行补注。赵学敏试图拟合笔记、本草著作、志怪小说、地方志书、传说轶闻等文献，希冀在各种不同来源的材料和证据中整合冬虫夏草的真实性理与药效，并为其找到合适的本草分类，将新发现的冬虫夏草融入已经确定的本草物质体系中来。

但是很明显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本草纲目拾遗》的创作对赵学敏的物质鉴别力、医药储备能力、文本感知力都有极高的要求，这从赵学敏多次对文本进行修改可以窥探：其续补之条，皆粘于文稿上方，粘条殆满^[24]⁴²⁸。不过幸运的是，本草知识的传承有一条明确的轨迹供赵学敏遵循，当西汉末年“本草”之名成立之后，本草学作为医学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呈现出知识结构系统化并迅速发展的趋势^[25]²⁹⁷。东汉《神农本草经》记录药物 365 种，并按药性将其分为上、中、下三品。随后南梁陶弘景将

① 据笔者与虫草从业者的交谈，冬虫夏草的味道香腥兼有，刚采挖出的新鲜虫草，味道比较淡，保存一段时间后，气味就会慢慢变浓，顶级的冬虫夏草味道香、腥味淡不刺鼻。

②（清）赵学敏《利剂十二种总序》（见《本草纲目拾遗》，清光绪十一年（1885）合肥张氏味古斋重校刊本，“总序”），当然边和对赵学敏父亲的身世表示了怀疑，认为其宦宦身份为书商建构，详情参见 He Bian, “An Ever-Expanding Pharmacy: Zhao Xuemin and the Conditions for New Knowled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7.2 (2017):287-319.

③ 关于清朝医药知识在商业化情境下的分离，可参见 He Bian, *Know Your Remedies—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126-153.

本草的自然属性用于分类，他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蔬、米食七类来归并本草，这种分类法是本草分类的一大发明^①。同时陶弘景对本草药物形态、产地、性味、采集和鉴别等方面的论述影响深远，此后千余年间，按照陶弘景的本草分类方法来甄别新的中药品种，一直是本草学的重点内容。至明代，李时珍又集大成地完成了《本草纲目》，垂范了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分类方法，并大大扩充了药物的品类，将本草药物的研究推向高峰。此后尽管有大量新药物涌入，但《本草纲目》并没有成为过时的文物，相反，它为各种事物的融入和整合提供了一个框架。在与历代本草学者们共享同一自然宇宙观与本草知识框架的前提下，赵学敏开始了《本草纲目拾遗》的创作，尝试将新药物冬虫夏草纳入本草体系之中。

赵学敏所处的时代也有新的机遇，清朝前中期的版图扩张和医药贸易的兴盛，让赵学敏能够接触到藏香、风磨铜、藏红花、野马豆等与冬虫夏草一样来自西部边陲的本草新品^②，赵学敏自身也尝试在主流本草知识之外建立新的知识生产领域，而这些药物知识正是来源于山人、土人、山僧、道人、屠户、番民、药客、商贩等相对边缘的群体，赵学敏与他们攀谈交流，勘误山慈菇，求证羊哀^{[24] 正误 1.376}，诸如此类的交际为赵学敏提供了大量的本草应用经验。当然，具备专业知识的医者、本草学者亦是赵学敏本草知识的重要来源。从《本草纲目拾遗》中我们可以发现，赵学敏与其亲近之人形成了可靠的知识传递圈层，其弟赵学楷锐意岐黄，著有《百草镜》八卷、《救生苦海》百卷，赵学敏多有引用。同时，赵学敏在邻人黄贩翁家中阅读了其所收藏的医书万余卷，当中包含大量未出版的医钞，对《黄氏医抄》《贩翁医要》《行篋检秘》的大量援引便是此类本草知识的展示，赵学敏的宗亲赵柏云也慷慨奉献出其历游方术、顶串诸法，贡献了大量走方医的治疗经验^{[26] 总序 1a-3a}。除此之外，赵学敏的本草知识也来源于叶天士、沈云将、汪连仕、张璐、卢之颐、吴仪洛、龙柏、吴震方、张圣来等本草学者及医者^③。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绝大多数都为江浙人士，冬虫夏草的记载者名单也清晰地映射出此种地域构成^④。细查可知，赵学敏所增补的新本草产地多以浙、闽、粤、滇四省为主^⑤，这说明本草知识的流转虽然在赵学敏周围形成了小范围的、同频共振的“知识共同体”，但是亦受到地域的局限，仅仅在江浙及其周边省份流转。由于赵学敏未曾离开江浙游历，所以在其构建的本草世界中，除却珠儿粉、狮子油、鸡血藤胶等少量得以亲证的远方本草之外^{[24]214,288,361}，赵学敏对来自异域远方本草的知识大多依赖于手稿著作或他人的间接经验，因此这可能让赵学敏在处理冬虫夏草等新本草药物时略显拘谨，甚至出现错误。

对比朱璋及赵学敏对冬虫夏草的记载可知，两者的文字几乎分毫不差。因而按照时间前后便能清晰地推断，赵学敏对冬虫夏草功效的叙述来源于他的钱塘同乡朱璋，朱璋称冬虫夏草产自华林坪，然而赵学敏在转记时却称冬虫夏草出四川江油华林坪。根据清代四川行省的建置沿革可知，华林坪属雅州府清溪县^{[9] 第1册卷四 569}，是通往打箭炉的要道，而江油县属龙安府^{[9] 第1册卷三 555}，与其并无关联。因而可以断定，赵学敏误将冬虫夏草的产地归为江油县，大概率是因为朱璋曾主治江油县。赵学敏同时依靠想象断言“必冬取其虫，而夏不取其草”，对冬虫夏草的采挖时间缺乏基本认知。上述错误无不显示出赵学敏对冬虫夏草这种来自异域远方的本草缺乏足够的了解。同时在赵学敏的论述中，冬虫夏草与那些早已被纳入本草体系中的“成熟”药材相比，也有明显的差别。一般而言，对于那些能够实地接触，或稍早被纳

① 山田庆儿称之为共世界分类法，参见山田庆儿《中国古代医学的形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第307-309页）。
② 关于冬虫夏草在清代贸易路线，芦笛认为大致方向为由西向东，不过芦笛的论述集中在19世纪中后期，此时赵学敏已经去世。参见 Di Lu,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1700-1949—A Microhistory of the Caterpillar Fungus,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23:76-82.
③ 详情参见（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第67、74、115、239、336、353、398、425页）。
④ 拾遗中记载冬虫夏草的江浙人士有吴仪洛、唐秉钧、唐方沂、平莱仲、朱排山、龙柏。
⑤ 如书中大量出现《岭南杂记》《岭表异录》《广东通志》《湖州府志》《漳州府志》《闽小记》《滇志》等文本。

入本草网络的药材，赵学敏会承袭《本草纲目》以大目为纲、细目为目的注解方式。有释名集解，以考名称形状；有气味主治，以别寒热功用；有发明，以著作其效；有正误，以定其讹；有修治，以和其性；主治未备，则有附方；物质相同，则有附录^{[24]凡例²}。如荔枝草，赵学敏曾在临安署中，见荒圃中多此物，颇为熟悉，因而其论述正是按顺序向我们展示荔枝草的别名、产地、形态、采治方法，前人记载的讹误之处，药材的性质和气味，以及其治病功能^{[24]134}。但是很明显在对冬虫夏草的叙述中，没有释名，没有丹方、药方，没有清晰可辨的主治，赵学敏除承袭朱璋将冬虫夏草与人参进行类比并诉诸想象之外，亦没有准确的用药经验，反而多引用他人的记载进行药性、药效说明，这再次映射出赵学敏对冬虫夏草认知的局限。当然，我们不能对此过于苛责，将全部责任归咎于赵学敏。清代名医徐大椿就曾指明本草功用的明晰需要长时间的检验：“盖药之功用，不止一端……一药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盖古人尚未尽知之，后人屡试而后知。所以历代本草所注药性，较之《神农本草经》所注功用增益数倍，盖以此也。”^{[18]35}

但最为重要的是，在赵学敏搭建的框架下，冬虫夏草从不知其原理的、来自异域外方的羌族上药，蜕变为阴阳主导的本草物质，赵学敏尝试用阴阳理论建构冬虫夏草的自然史知识，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运用阴阳观对冬虫夏草的形成、转化进行阐述：

物之变化，必由阴阳相激而成，阴静阳动，至理也。然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谓一阴一阳，互为其根。如无情化有情，乃阴乘阳气，有情化无情，乃阳乘阴气，故皆一变而不复返本形。田鼠化鴛，鴛化田鼠，鸠化鹰，鹰化鸠，悉能复本形者，阳乘阳气也。卵石化丹砂，断松化为石，不复还本形者，阴乘阴气也。夏草冬虫，乃感阴阳两气而生。夏至一阴生，故静而为草；冬至一阳生，故动而为虫。辗转循运，非若腐草为萤、陈麦化蝶，感湿热之气者可比。^{[24]130}

不难看出，“阴阳”二字是赵学敏解释冬虫夏草的关键，他在论述开头便引用阴阳互根理论，赵学敏认可阴阳二气是世间万物生长变化的根源，且阴阳互根，不可分割，正如《黄帝内经》所言“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13]112}，只有兼具两者万物才能生长变化。冬虫夏草兼备阴阳二气，故而辗转循运，在虫、草之间转换。

赵学敏关于冬虫夏草生长、转换和阴阳之间关系的阐释极其重要，这种关联的建立，为时人提供了可以理解的自然史知识，为疾病诊治提供了理论合法性。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医药实践中，使用自然物质作为药材的医者，应该事先了解该物质的自然特性，而物质所具有的材性神灵将会直接决定它的药效，一个不了解冬虫夏草自然史及其特性的医者，则如无目夜游、无足登涉，动致颠殒，而想要愈疾者，未之有也^{[22]38}。

更为具体来说，赵学敏对于冬虫夏草的推理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作为本草博物者，既然对冬虫夏草的外部形色有所了解，那么究其物源，则可达法象之本，明晰其自然之理；其二，如若吴仪洛等人所述的本草性味为真，那么作为用药者，谙达其理，则冬虫夏草功效自明。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过作为博物者与医者其侧重略有不同。《太医局诸科程文格》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古人究物，取形色法象者众，良医用药，取形色配合者希。”^{[27]11}古人虽然经常借用形色法象解释物理，但多适用于器物，良医用药却很少根据药物的形色来配伍。就如丹砂法火主心之说，实取其材性之能，因以五行而附会，用药之法，诚不必泥^{[27]12}。赵学敏的论述显然以探究材性之能为主，忽略形色法象，直指冬虫夏草的药性功用。

进一步而言，既然材性之能决定了本草的功效，那么医者该如何探析冬虫夏草等本草的材性之能？又如何运用材性之能来进行治疗？清代名医唐容川与其门人张士襄针对本草药物治疗原理的探讨或许能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张士襄请教其师曰：“药者，昆虫土石，草根树皮等物，与人异类。而能治人之病者，何也。”唐容川的回答是：

天地只此阴阳二气，流行而成五运，对待而为六气，人生本天亲地。即乘天地之五运六气

以生五脏六腑。凡物虽与人异，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以生，特物得一气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耳。设人身之气偏胜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盖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故神农以药治病。^[28]

唐容川回答的根基在于万物同源的气本论，在他看来，人、药与自然界万物都是禀天地之气而生，并且两者之间可以互通，阴阳二气直接主导了世界万物的兴衰荣盛，因而本草药物使用的根本原则可以简化为“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所以在清人的想象与认知中，冬虫夏草的药效与使用也须以阴阳为根本遵循，当人体的阴阳平衡被打破时，医者必须知晓和操控药物的阴阳两面，以推动人体重新恢复平衡。而这一治疗原则可在冬虫夏草的诸多药性解析中窥视，如上文赵学敏认为“冬虫夏草入药能治诸虚百损，以其得阴阳之气全也”，再如唐容川根据阴阳不同的原则分开使用冬虫夏草，“欲补下焦之阳，则单用（冬虫夏草）根，若益上焦之阴，则兼用（冬虫夏草）苗”^{[28]79}，虽然这是典型的法象用药，依据根、梢入药部位的异同来决定药效，但其根据依然在于冬虫夏草的根（虫）与苗会因阴阳属性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用。在唐容川看来，冬虫夏草其根生于冬至，阳气盛也，故补下焦之阳。其苗夏至入土，阳入阴也，故益上焦之阴^①。又如《本草纲目拾遗》引张子润言“夏取（冬虫夏草）者服之，能绝孕无子”^{[24]129}，张子润的认知也是阴阳观的映射，《黄帝内经》有言“阴阳和，故能有子”^{[13]22}，人是阴阳二气平衡的产物，但冬虫夏草在夏天为“至阴”之草，如果女性服用，则有阴盛阳衰之象，故而无法怀孕。

王孟英《重庆堂随笔》亦言“（冬虫夏草）至冬而蛰，德比潜龙，凡阴虚阳亢而为喘逆痰嗽者可用”^{[29]564}，根据东汉经学家马融对潜龙的解释，“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初九，建子之月，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也”^{[30]2}，潜龙寓意着阳气潜藏，阴气正盛，所以冬虫夏草可以治疗阴虚阳亢诸病。当然，阴阳观主导下的认知也会造成明显的窠臼，如赵学敏一样，有医者认为冬虫夏草于秋分日采摘者良^{[29]662}。但只需要稍做功课，就会知道虫草的采集只有4月底到7月初方可进行，这些套用阴阳理论而想象出的神奇功效，反映了清人因交通地域限制而在医药认知上的局限。

以今人的视角来看，清人对于冬虫夏草的药效推演与施用原则多有荒诞不经与臆想的成分，但这种看法明显带有后人的“科学”偏见。因为对于清代的士大夫与医者而言，冬虫夏草是在当时的阴阳宇宙观背景下被塑造而成的产物，他们的用药决策透露着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本草体系由阴阳宇宙观筑基，这个体系完善而自洽，由本草的自然史知识、本草经典文献、医者、医方以及他们的用药经验理论组成，只有在阴阳宇宙观的支撑下，他们才能信任、依赖冬虫夏草，毫无困惑地使用冬虫夏草这一来自自然的药材治疗疾病。

四、效验为重：医学实践之下的药效功用

虽然在阴阳观主导下，对于冬虫夏草的药性记载大多源自中医抽象理论的推演，其实际功效值得推敲。但不容忽视的是，部分以临证治疗为核心的本草医药典籍中关于冬虫夏草补肺益肾，治疗咳症的记载，其效果往往是可靠的，并得到各种案例的佐证。这说明在以阴阳为核心的药性理论指导之外，对冬虫夏草的药效认知存在着另一套主导机制。清代医药典籍中记载的冬虫夏草的药效如下（表1）。

① 阳受气于上焦，所以上焦之阴亦是“阳入阴”。

表1 清代医药典籍中冬虫夏草的药效

出 处（成书年份）	药 效	
《本草从新》（1757）	甘平，保肺益肾，止血化痰，已劳嗽	
《脉药联珠药性考》（1795）	味甘，性温，秘精益气，专补命门	
《重庆堂随笔》（1808）	治诸虚百损：虚疰、虚痞、虚胀、虚痛，喘逆痰嗽，调经种子，阳气下陷之病	
《本草分经》（1840）	甘，平。补肺肾，止血化痰、治劳嗽	
《本草纲目拾遗》 ^① （1765）	功与人参同，治诸虚百损	
	补精益髓	转引自《四川通志》
	保肺气	转引自《文房肆考》
	和鸭肉炖食大补	转引自《柳崖外编》
	治腰膝间痛楚，有益肾之功	转引自《柑园小识》
	房中药，兴阳	转引自潘友新
绝孕无子	转引自张子润	
种子，治蛊胀	转引自周兼士	
《本草问答》（1893）	补下焦之阳，益上焦之阴	

上文已分析指出，冬虫夏草的实际功效与药性理论的抵牾之处，医家唐秉钧也对此提出过质疑，但他同时记载了其友弟使用冬虫夏草的案例：

应奎书院山长孔老师讳继元，号裕堂，系先圣裔。桐乡乌镇人，诚正君子也。述伊弟患怯，汗大泄，虽盛暑处密室帐中，犹畏风甚。病三年，医药不效，症在不起。适戚自川解组归，遗以夏草冬虫三斤，逐日和葷蔬作肴炖食，渐至全愈。^{[19]276}

孔继元之弟已呈病入膏肓之势，盛暑即使在密闭良好的屋子里，依然十分害怕风吹。根据“邪在肺则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13]178}的理论，其必然是患有肺病，魄汗未藏，而大量服用冬虫夏草后，肺病渐愈。在实际案例的佐证下，唐秉钧开始相信冬虫夏草可保肺气。并且唐秉钧嗣后用之，俱奏效^{[19]276}。在唐秉钧对冬虫夏草态度转变的关键之际，蕴含着中医药学家在处理医药理论与实践不一致时的微妙取向。作为“司命之师”，他们不得不审慎用药，正如医药大家缪希雍所点明的那样，“业作医师，为人司命，见诸苦恼，当兴悲悯。详检方术，精求药道，谛察深思，务期协中。常自思维，药不对病，病不对机，二旨或乖，则下咽不返。人命至重，冥报难逃”^{[31]34}。因而药物实际效验压盖过理论的推演是合理的。同时，这套与理论并轨的实践纠错机制也为解释吴仪洛论述的矛盾之处提供了可靠的回答。

冬虫夏草对肺疾及咳症的治疗，亦可在各种医案中得到佐证。清代温病学派代表人物邵兰荪在医案中就曾记载：“大西庄（马），病损成癆，呛咳，形寒盗汗，曾经失血，脉小数，舌黄。肺气受戕，非轻藐之症。”^{[32]47}邵兰荪开了4贴药，其中便用到了一钱半的冬虫夏草，他在论及病情及冬虫夏草的功效时称：“此人肺气受戕，故初方全是清肺生津之品，佐以善治肺癆之冬虫夏草。”^{[32]48}邵兰荪肯定了冬虫夏草在治疗肺病时的奇特功效。但可惜的是，邵兰荪未曾在医方后注明病情的转变和最后的治疗效果。又如陈莲舫在医案中描绘病者久咳成癆的案例：“（病者）久咳不已，娇脏受伤，痰中带血，其色不一，或黄或绿，肺痿渐成，脉见细弦，治以清养。”^{[33]127}冬虫夏草再次与川贝、三七等清肺中药一同出现在药帖中。当然，对冬虫夏草使用最频繁的莫过于清代温补大家王孟英，他认可并接纳了赵学敏关于冬虫夏草生长、转换的理论，但在药效功用上又有自己的洞见，在王孟英的医方中21次提及冬虫夏草，其中有9次用冬

① 《本草纲目拾遗》成书于1765年，定稿于1803年，初刊于1864年。

虫夏草治疗咳症^①，因而我们可以断定，王孟英认为冬虫夏草的主要功效便是治疗咳症，但是很明显，冬虫夏草在传统医药体系中光有实际的药效是远远不够的，医案所具有的辨证论治性质决定了王孟英需借用药性理论来契合对患者病因证候的描述，并向患者及其他医者展示其用药效佳的医案。上文已述王孟英认为冬虫夏草能治疗由虚证引起的喘逆痰嗽，而细读可知，在王孟英所列的9则与咳症相关的医案中有8则皆由虚损引起，他在一则医案中如此写道：“钱氏妇患嗽数月，多医莫治，渐至废寝忘餐，凛寒乍热，经停形瘦，心悸耳鸣，滋补填阴，转兼便泄。孟英视脉虚弦缓大，而气短懒言，卧榻不支，动即自汗。曰：固虚也，然非滋阴药所宜。予参、芪、龙、牡、桂、苓、甘、芍、冬虫夏草、饴糖，大剂服旬日而安。”^{[34][37]}冬虫夏草的药效与药性理论在“虚”的指引下实现了逻辑自洽。

更进一步来说，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并掺杂着抽象用药理论的医案，其对冬虫夏草的使用是否准确？医案的记载是否能够持续产生可靠的知识？费侠莉的研究指出，法律案件作为先例，产生了基于案例类推、推理的知识生产模式，医案的书写内容、格式很大程度上受法律案件的影响，医者在面对患者之际就如同法官审理罪犯，需要依靠经验全面判断疾病，医案对病情的论述可能对患者的生死做出最终裁决，而这时仅仅依靠医者的专业知识已不能胜任，还要求医者有强大的精神力量^{[35]1-30}。中医对于病理的判断诉诸抽象而游动的阴阳、血气、脉搏，不能有确切的指明，因而在面对症状相似的病例时，医者往往会给出不同的治疗措施，由于尚未有集体认可的治疗机制，当患者看到医案时，他们一开始的选择常常会受到所谓“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医者的社会地位，或是他们与医者的私人关系。因而无论从医者还是患者来说，中医医案内容的主观性都较强，但这并不是否认医案的可靠性。实际上，这种将专业知识与经验结合起来的案例方式，是沿用至今并被现代法学、医学和商学都认可的知识生产模式，不过在工业革命之后，科学理性主导下逻辑的假设演绎方法以及实验科学的归纳方法遮蔽了基于经验与知识结合的“案例”思考模式，才让我们对有大量医药个案佐证的本草经典产生怀疑。

综上，以吴仪洛、赵学敏为代表的本草学者与医学家，借助性味药理与法象药理阐释冬虫夏草的药性功效，将其纳入以阴阳为主导的本草网络中，并在阴病阳治、阳病阴治的原则下使用冬虫夏草。尽管这套用药理论存在种种缺憾，但基于阴阳体系塑造而成的本草网络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草体系的生产下，冬虫夏草从藏区的新奇异物蜕变为阴阳兼备的珍贵药品。同时与本草理论并轨的医药实践也为推动清人接纳冬虫夏草做出了贡献。清代医者在实践基础上逐步摸索出冬虫夏草的部分实际功效，用冬虫夏草治疗肺病、咳症等疾病，并将其记载于医案之中或升华总结为本草著作中的药效，因此对于医案及本草著作中关于冬虫夏草药效的记载，我们不应贸然否定。

本文将冬虫夏草放置在本草性质认知与医疗习惯的历史脉络中进行叙述，回顾了1711至1893年间^②，冬虫夏草从发现到被本草学者与医者认知、使用的全过程。就本文的主旨来说，对于冬虫夏草本草理论、药用方式的探讨，最终目的乃是重构一个具有通时属性、质属医药层面的冬虫夏草本草史。具体来说，重塑冬虫夏草的完整本草史，不仅是指在文本中重新刻求冬虫夏草的记载与药用起源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以不同类型文本中记载的冬虫夏草为源点，追索冬虫夏草被清代地理环境、观念思想、医药实践包裹渗透进而重塑的漫长历程。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冬虫夏草作为“物”与清代社会文化的接触中，逐渐附身其后的正是本草知识传承、用药理论及其实践等诸多因子，冬虫夏草如珍珠般被层层包裹，进而来自异域外方的“草根树皮”，凝结成清人认知中能治疗阴虚阳亢诸病的神奇本草，最终停留在本草这

① 参见（清）王孟英《王氏医案续编》《王氏医案三编》《归砚录》《乘桴医影》《古今医案按选》（收录于盛增秀主编《王孟英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第323、344、349、371、376、379、384、386、397页）。

② 1711年朱璋首次记录冬虫夏草，1893年唐宗海在《本草问答》中用阴阳观解析冬虫夏草治疗原理，为本文引用最晚之史料。

个传承有序，包罗万象的巨大知识体系之中。

通过对冬虫夏草流通旅程的管窥，我们得以了解形形色色的清代人物，官员、文人、博物学家、本草学者、医家在此过程中一一现身，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检视并使用冬虫夏草，正是他们的合力，让冬虫夏草在清朝的物质文化体系里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成为治愈人体疾病的重要力量。但历史永不停歇，伴随着西学东渐的“科学”浪潮，冬虫夏草又被推促着接受新视域的检视，在民国医药“科学化”的潮流下，冬虫夏草有被医者或其他专业人士用生物学、化学、药理学等知识重新解构的趋势，无论是物质层次的实存状态抑或是概念层次的抽象特质，冬虫夏草都历经了巨大的转变，冬虫夏草与其依附的本草体系在西医的冲击下摇坠，丧失了理论主导之权，但被“科学”所浸润的西医化约主义（reductionism）同样无法归纳演绎出冬虫夏草的真实功效，当然也不可能定其一是，完全将冬虫夏草从本草网络中剥离。冬虫夏草反而在两者的共同淬厉下，呈现出复杂纠葛而又独立演进的多重面相，成为观察民国时期中药“科学化”境遇的绝佳窗口。由此观之，中医本草体系与西医技术网络的竞轨必将长久地以冬虫夏草为主题进行呈现。

作者贡献度声明

辛豪：独立完成选题、搜集资料，撰写、修改论文。

参考文献

- [1]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第1部 [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
- [2] Nappi C. *Winter Worm, Summer Grass: Cordyceps, Coloni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Objects*[J]. in Anne Digby et al. (eds.), *Crossing Colonial Historiographies Histories of Colonial and Indigenous Medicines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0:21-36.
- [3] 柯传奎. 话说冬虫夏草 [M].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 [4] 陈守常. 虫草考证 [J]. 农业考古，1993(1):2.
- [5] 芦笛. 青藜徐照、唐方沂与夏草冬虫 [J].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研究，2015(1):49.
- [6] 龚廷贤. 寿世保元 [M]. 日本正保二年(1645)风月宗知刻本.
- [7] 薛清录.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 [8] 黄廷桂. 雍正四川通志卷21 西域 [M]. 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清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
- [9] 常明, 杨芳灿. 嘉庆四川通志6 卷一百四职官(六)[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 [10] 陈聂恒. 边州闻见录 [M]. 谢本书，主编. 清代云南稿本史料.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 [11] 朱璋. 观树堂诗集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2] 吴仪洛. 本草从新 [M]. 陆拯，赵法新，陈明显，校点.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 [13] 黄帝内经 [M]. 姚春鹏，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4] 神农本草经 [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
- [15] 庄周. 周易 [M]. 宋祚胤，注译.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0.
- [16] 赵佶. 圣济经 [M]. 苏兴华，校点.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
- [17] 吴仪洛. 成方切用 [M]. 李志庸，廖俊翔，支济靛，注.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3.
- [18] 徐灵胎. 医学源流论 [M]. 刘洋，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
- [19] 唐秉钧. 文房肆考图说 [M].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 [20] 姚澜. 本草分经 [M]. 范磊，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 [21] 龙柏. 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 [M]. 苏颖，赵宏岩，张茂云，等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 [22] 刘完素.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M]. 宋乃光,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 [23] 赵献可. 医贯 [M]. 晏婷婷,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9.
- [24] 赵学敏. 本草纲目拾遗 [M]. 闫志安, 肖培新,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 [25] 山田庆儿. 中国古代医学的形成 [M].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2003.
- [26] 赵学敏. 本草纲目拾遗 [M]. 清光绪十一年 (1885) 合肥张氏味古斋重校刊本.
- [27] 何大任. 太医局诸科程文格 [M]. 刑玉瑞, 孙雨来,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 [28] 唐容川. 本草问答 [M]. 陆拯, 校点.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 [29] 王孟英. 重庆堂随笔 [M]// 盛增秀. 王孟英医学全书.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 [30] 孙星衍. 周易集解 [M]. 成都: 成都古籍出版社, 1988.
- [31] 缪希雍. 祝医五则 [M]// 任春荣. 缪希雍医学全书.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 [32] 邵兰荪. 重订邵兰荪医案 [M]. 曹炳章, 辑.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9.
- [33] 陈莲舫. 陈莲舫先生医案集 [M]. 肖梅华, 点校.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 [34] 王孟英. 王氏医案三编 [M]// 盛增秀. 王孟英医学全书.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 [35] Furth C. *Thinking with Cases: Specialist Knowledge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M].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本文编辑 黄晓华)